

伊斯兰教与全球软环境治理

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动员”^{*}

张金平 徐以骅

摘 要: 以宗教名义进行社会动员,是当代全球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宗教动员下的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代恐怖主义的主导势力,并经历了三重路径,且每条路径中都表现出国际“安全阀”遭到双重的破坏和挑战。梳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因“宗教动员”而泛滥的路径,可以为国际反恐提供某种思路,从而消除恐怖主义进行“宗教动员”的不良后果,并优化良好的宗教发展环境。

关键词: 宗教动员; 宗教与国际关系; 反恐斗争; 宗教回归; 恐怖主义

作者简介: 张金平,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云南昆明 650031);徐以骅,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1)03-0065-08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6JZD0005)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06CGJ002)的中期成果。

一、宗教已成为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帜

从20世纪六十年代到21世纪的当前,恐怖主义在全球迅猛蔓延,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显性问题,如20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相继出现的左翼恐怖潮、劫机潮、慕尼黑事件;20世纪八十年代,在黎巴嫩等中东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绑架和自杀式袭击的恐怖事件,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的恐怖袭击;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东非大爆炸以及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的活跃;21世纪的“9·11”事件、巴厘岛爆炸案、马德里“3·11”爆炸案、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等事件的次第发生,震惊了国际社会。

一方面,恐怖主义的极端暴力行为^①震惊国际社会。一系列重大袭击事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如“9·11”事件、东非大爆炸和巴厘岛爆炸案等;与此同时,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持续不断且自

^① 极端暴力行为是对背离社会常态秩序行为的指称。在每个时代,人类社会都设想集体或个人行为应该符合本时代社会秩序的行为,与此相对,不符合社会秩序规范的行为即有悖于现代人类观念的行为往往被称之为极端。参见雅克·塞姆林:《极端暴力:我们能理解它吗?》,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3年11月。暴力行为就常常存在极端行为,如暗杀、大屠杀等。但极端行为就存在并且来源于人类社会,理解极端暴力形式之一的恐怖主义,必须认识到这种极端行为不是外来的。也正是因为内在于我们的社会,这种极端暴力形式方得以与种种精神或意识结合而获得极端暴力生命力。参见罗伯特·O.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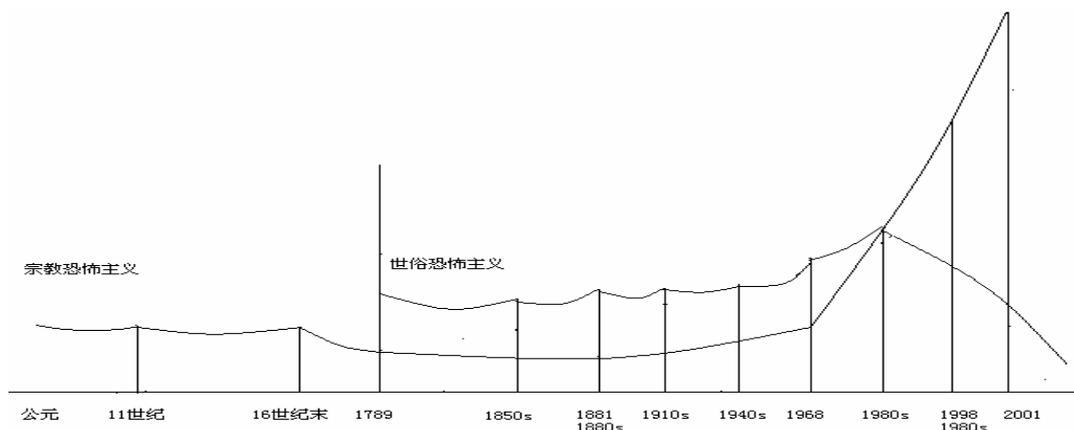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文中涉及的“宗教恐怖主义”均应为“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恐怖组织”均应为“宗教极端组织”,“宗教恐怖暴力”均应为“宗教极端暴力”。

20 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到 21 世纪初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国际恐怖主义的组织规模和行动能力（特别重大袭击的规模）迅猛膨胀，恐怖主义组织规模扩大的同时形成全球网络并在全球组织恐怖资源、发动恐怖袭击。恐怖袭击手段越来越残忍，恐怖组织采取自杀式袭击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如人体炸弹+劫机撞击+网络组织等形式）^{[1]227-228}、生化袭击等手段，甚至谋求核袭击有意造成了平民的最大伤亡；恐怖组织、恐怖袭击遍及世界各地，全球恐怖组织之间的网络状联系越来越突出，甚至在恐怖袭击的战略行动上相互呼应。^{[2]75-82}因此，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以宗教话语和旗帜动员其恐怖能量，宗教与恐怖主义的联系日益密切。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宗教恐怖主义呈现持续、迅猛发展和膨胀的态势，越来越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导势力。

20 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宗教恐怖主义主要活跃在黎巴嫩、埃及和斯里兰卡。到 20 世纪九十年代，宗教恐怖主义迅速在全球活跃起来，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巴勒斯坦、以色列、苏丹、阿尔及利亚、爱尔兰等国和地区的宗教恐怖主义的活动都十分活跃。进入 21 世纪，以“9·11”事件为标志，在中亚、俄罗斯、南亚、东南亚、中东、东非、西欧、北美等地，宗教恐怖主义活动极为频繁，世界几乎没有不面临宗教恐怖主义威胁的地区，宗教恐怖主义形成了全球网络和循环圈。^{[3]146-152}

在当代活跃的恐怖组织中，绝大多数属于宗教恐怖主义，或与宗教有着某种关联。除希腊和拉美的左翼恐怖组织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恐怖活动外^{[4]31-32}，当今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主要是宗教恐怖主义组织所为。印度教、锡克教、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背景的极端组织（分子）都实施过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9·11”后全球所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几乎都是宗教恐怖主义袭击（参见下图）。

世界宗教恐怖主义与世俗恐怖主义潮流比较^①



从以上图表可见，在时间跨度上，当代世界宗教恐怖主义的兴起是迅猛的。在古代，宗教恐

① 这是一幅概念性示意图而非严格量化示意图，曲线表示恐怖活动特别是恐怖暴力的影响。参见张家栋：《恐怖主义论》，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胡联合：《全球反恐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 年版；朱素梅：《恐怖主义：历史与现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版；张金平：《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M. E. Sharpe Inc.,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errorism*, Chicago and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M. E. Sharpe Inc., *Encyclopedia of World Terrorism 1996-2002*, New York: Sharpe Reference, 2003.

怖主义占据恐怖主义的主导地位，是容易理解的。近代以来，在宗教、政治和思想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大事。因此，从世界性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世俗恐怖主义在长达两个世纪中主导着世界恐怖主义的旗帜。但在现代化以全球化的形式更为深入、深远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竟然在沉寂两个世纪后经过短暂的 30 年时间就迅猛兴起、膨胀和泛滥，并在 21 世纪的第一年以前所未有的袭击发出了强劲的恐怖宣言。

为什么国际恐怖主义以“宗教”旗帜得以全球泛滥？考察当代恐怖主义的路径，可以看到当代世界宗教恐怖主义兴起、蔓延和极度膨胀的路径，恰是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多地利用或借用宗教话语和旗帜进行恐怖能力积聚和恐怖动员的路径；宗教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迅猛扩展与膨胀，正是一系列以宗教为旗帜和表征的动员结果。极端暴力势力和恐怖组织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以“宗教”为旗帜的动员活动，通过不同的路径一步步造就、推动了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滥觞，并形成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特征：一方面，宗教恐怖主义以宗教名义鼓动恐怖主义、进行恐怖主义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宗教恐怖主义还以宗教名义实施恐怖暴力并为之寻求合法性。分析当代宗教恐怖主义在“宗教”旗帜下的动员过程，有助于理解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形成路径，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反恐斗争。

二、第一条路径：世俗力量的“宗教动员”聚集宗教极端势力

在这条路径中，“宗教动员”的主体是世俗政治力量，包括国家力量和国际力量；动员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激进分子和普通教众；动员的目标是出于世俗政治斗争的需要；动员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些宗教势力。在这一动员路径中，被动员的宗教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曾服务于动员主体的政治目标，但一些宗教激进力量被动员起来并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较强的组织力量，从而在之后成为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骨干。这一路径的动员，对当代宗教恐怖主义势力的聚集和膨胀来说既是间接的，又是根本性的。因为这一“宗教动员”给宗教极端势力的聚集、扩展创造了环境。

近代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各种形式的世俗政治力量在政策设计时，都力求将宗教排斥在政治事务之外而避免宗教力量对政治的干预。然而，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和国际力量以“宗教”作为旗帜动员社会力量以期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如埃及“7·23”革命后长期坚持世俗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但萨达特总统执政后，大力扶植宗教势力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基础。然而在埃及浓厚的宗教传统氛围中，被萨达特动员起来的宗教势力迅速膨胀并走向了萨达特总统的对立面，最后，萨达特总统自己为宗教恐怖分子刺杀。再如印度尼西亚，1965 年苏哈托发动政变上台后于 20 世纪七十年代大力扶植宗教势力以抵消和对抗军队势力。^{[5]78}虽然在七十年代末苏哈托开始控制宗教势力的发展，但这股势力一经动员聚集，就不是可以轻易控制和清除的。印尼的宗教势力后来在有利的国际社会环境下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并不断走向极端，制造了包括巴厘岛爆炸案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中亚宗教势力的膨胀也同样得到了世俗政权的支持^{[6]72}，并出现了一系列宗教恐怖主义活动。

苏联出兵阿富汗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以及巴基斯坦等国极力以“宗教”旗帜动员国际社会力量到阿富汗与苏联对抗。以在阿富汗战场成长的本·拉登为首的宗教极端势力和为数不少的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形成了国际宗教极端势力网络并逐渐演变为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的骨干力量。正是这股宗教势力在中东、东非、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推动了当地宗教恐怖主义的迅猛蔓延。

美国等世俗政权无意扶植宗教恐怖主义，但美国等国家的“宗教动员”确实扶植、动员和纵

容了多股国际宗教极端势力。这种权宜之计式的思维与政策，在处理波黑冲突时依然延续，致使宗教激进分子在组织联络和观念极端化方面得到强化。这些力量一旦凝聚成强大的组织力量，就不会再完全沿着美国等国际力量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是利用国际社会适宜的环境，进行宗教再动员，其思想在越来越激进、极端的同时，一步步走向恐怖主义。

一些国家的世俗政党，在借重宗教政党的同时传递了“宗教动员”的信息，鼓励了宗教势力，往往导致宗教极端势力的聚集、膨胀，进而为恐怖势力所利用。1999年成立的“以色列变革运动”，主张政教分离，强烈反对宗教干预政治，曾表示不与极端宗教党同时参与政府组阁。但到2004年该党参加内阁后，其领导人公开表示不排除与极端宗教政党（如圣经联合犹太教集团）联合组阁。而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则常常吸收宗教政党组阁。以色列的宗教恐怖势力一直很强大，与世俗政党的“宗教动员”纵容是有很大关系的。

世俗力量在进行“宗教动员”时，忽略了两个“安全阀”，一是意识和思想“安全阀”，二是组织“安全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埃及和印尼，在进行“宗教动员”时忽略了对主导意识的培养、巩固，机会主义地迎合、利用宗教社会力量，在意识和思想上传递出模糊信息。结果宗教社会势力在被动员的同时就易于极端化，为恐怖分子所利用。而当宗教社会力量被动员组织起来后，没有在组织上予以正确的引导。美国等国家在冷战后不仅没有严肃对待这股被宗教动员起来的宗教势力，反而在一段时间内置若罔闻、放任自流，进一步纵容了宗教极端势力的扩展。埃及等国家面对被动员起来的日益强大的宗教社会力量显得束手无策，因为宗教社会力量有组织地掌控了许多舆论以及学校、教堂等基地。

三、第二条路径：社会力量的“宗教动员”衍生宗教极端势力

在这条路径中，“宗教动员”的主体是宗教社会力量，主要是一些宗教复兴运动的组织；动员的对象主要是最广大意义上的教众和最广泛的民众；动员的目标是推动宗教复兴的进一步发展；动员的结果是宗教社会力量的组织性大为加强，一些宗教组织的极端势力倾向抬头并且急剧增强。

20世纪六十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种复兴景象^{[7]2}，被称为“去世俗化”（或“非世俗化”）、“宗教全球复兴”、“世界的复魅”、“全球无神论的衰退”等。“保守的、正统的或传统的运动，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兴起。”^{[8]7}“犹太原教旨主义分子……发誓与之（定居点）共存，即使他们的政府撤离该地区。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分子使政府确信需要撤出联合国人口基金。”^{[9]193}新兴宗教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并成为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10]27}宗教在全球的活跃，推动了宗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繁荣期。^{[11]247}

宗教复兴潮波及世界各地，成为全球现象。该潮流表现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其政治参与形式包括信徒个人、群众、宗教团体等。^{[12]89-93}宗教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宗教化）现象与国际冲突密切相关^{[13]45}，宗教成为当代世界冲突和问题探讨中重要的政治意识指导、政治动员的资源、政治分析的根据和框架，并自然成为政治、社会动员的鲜明旗帜。

犹太教是以色列的民族宗教。虽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曾设想以色列是一个纯粹世俗化的国家，但浓厚的宗教传统使宗教政党在当代以色列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以色列宗教政党主要有沙斯党、全国宗教党和圣经联合阵线，宗教党的支持者总体来说比较稳定，近年来以色列宗教政党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席位有上升趋势，成为各执政党在组阁中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对内外政策特别是有关中东和平进程的相关政策影响较大。2010年2月，在宗教党的压力下，约旦河西岸宗教

古迹^①被列为以色列遗产，以色列计划修缮相关遗产。

苏联解体后，中亚宗教复兴运动发展迅猛。随着宗教场所的恢复和宗教活动的增加，宗教组织不断涌现。从1997年起，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呈现出迅速扩张的势头，鼓吹政教合一。中亚的“伊斯兰复兴党”、“伊斯兰解放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十分活跃，他们利用中亚独立后国家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合法地位，参与政治选举，挑战世俗政权。在宗教组织和党派大量涌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宗教极端组织。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军”、“扎莫阿特”等，并在费尔干纳盆地形成了中亚极端势力的中亚活动中心。这些组织在1997年年底不到10天内，先后在纳曼干州制造了3起恐怖案件。

在宗教复兴大潮中，阿尔及利亚的宗教党派势力激增，成立不久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拯救阵线”即在1990年地方议会选举和1991年的多党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合法宗教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成立的前后，阿尔及利亚还出现了一些极端组织，如“伊斯兰武装集团”、“萨拉夫宣教与战斗组织”、“阿尔及利亚人”等。大选结果被取消后，“伊斯兰拯救阵线”中的激进分子就组织伊斯兰拯救军进行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暴力活动。埃及的许多宗教极端组织也产生于萨达特时代，有的是从合法组织中分化产生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印度人民党”曾一度执政，在印度形成国大党与人民党的教俗政党争夺态势。印尼解除党禁后伊斯兰色彩的政党纷纷成立，土耳其的宗教政党长期控制政府。伊拉克新的政党多是在伊斯兰教各教派的基础上成立的。

在如此强劲的宗教复兴运动下，宗教社会力量的“宗教动员”一方面凝聚了公开合法的宗教性的政党与组织，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暴力组织势力的扩张。在这一动员过程中，“安全阀”在话语和政治资源两个层面上失控。“宗教”成为巨大的社会、政治动员话语，而世俗政权和理念的动员能力被“矮化”、“弱化”而显得苍白和软弱。这既有宗教复兴运动高涨的因素（浓厚的宗教话语氛围，本身就在传递着一种强烈的政治信息），也有世俗政治势力面对宗教话语的强劲而无所作为、甚至迎合宗教话语所造成的政治动员话语的严重失衡的原因。

在社会动员中，鲜明的宗教话语不断地得到强化。正是宗教话语的不断强化，合法的宗教政党与组织在被动员的同时，宗教极端组织和势力也在衍生，于是，迅猛的宗教复兴运动凝聚相当大的社会力量，“强宗教”和“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随之崛起。^{[7]5}一些合法宗教组织因宗教话语的异化而衍生、分化出极端暴力组织和恐怖组织。浓厚的宗教话语氛围，为极端暴力倾向的膨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宗教力量一旦掌控了学校、教堂、舆论、巨额资金等重要社会、政治资源，而国家政权不能及时、有效地予以引导和调整，这些资源就突破“安全阀”而超越合法的宗教活动成为极端暴力的工具。从埃及、以色列、阿富汗、南亚、中亚和北非的宗教恐怖主义泛滥中，都可以发现这些资源被广泛用于“宗教动员”。这些资源为“宗教动员”提供了巨大能量，为宗教恐怖组织的活动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场所、人员和资金的帮助，恐怖组织利用合法宗教资源“安全阀”的失控才得以壮大了自身力量。

^① 以色列政府计划动用1亿美元保护以色列全国各地的遗产场所。这两个约旦河西岸的圣地原不在修缮计划中。内塔尼亚胡在其宗教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联合政府伙伴提出要求后将这两个圣地纳入计划。其中希伯伦的“始祖墓穴”是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圣地。同时，巴勒斯坦宣称，约旦河西岸是未来国家的一部分，极力反对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存在。

四、第三条路径：极端暴力势力的“宗教动员”导致恐怖主义泛滥

在这条路径中，“宗教动员”的主体是宗教恐怖组织，动员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极端分子和普通教众，动员的目标是积聚实施恐怖行动的力量和资源等能量，动员的结果是导致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的全球泛滥。

在“宗教动员”下，一些极端暴力倾向的势力在宗教旗帜下被动员和组织起来，获得足够强大的组织化能量，并在浓厚的宗教社会氛围中得到推动而逐渐强化。这些具有极端暴力倾向的组织，在适宜的话语、政治环境下，将“自觉”地进一步进行“宗教动员”。宗教极端话语通过进行极端暴力活动的动员，逐渐走向恐怖主义。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当代，恐怖组织以宗教进行动员，往往获得倍增效应。通过极端宗教话语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扭曲性分析、对极端暴力和恐怖活动的宣扬与解读^{[14]193-195}，恐怖“镜像”“自然”地得出实施恐怖暴力袭击的动机，也“自然”地得出将平民作为恐怖暴力袭击对象的合法性。这些恐怖主义的结论，在“宗教动员”的宏观社会环境中，会有不小的市场，因此恐怖主义组织能够在全球获得惊人的活动资源与能量。

1996年10月，“基地”组织头领本·拉登以宗教话语蛊惑针对美国的恐怖暴力。本·拉登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将美国的中东政策看做犹太复国主义和基督教十字军对伊斯兰世界的联合侵略，二是谴责美国对伊斯兰教圣地（包括阿克萨清真寺）的驻军和占领。本·拉登的结论是，以恐怖暴力“杀死”和赶走占领者、在世界各地实施针对美国人及其盟国民众的恐怖暴力，是穆斯林一种合乎逻辑的宗教义务。基地组织不停地发出同样的动员令，通过宗教极端思维的“镜像”蛊惑恐怖暴力。^{[14]126-127; [15]316-317}“基地”的极端宗教动员，在中东、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在世界更为广泛的地区，竟然都能获得一定的认同。

“在以色列也存在极端（宗教）民族主义恐怖组织，如‘卡赫’（Kach）及其分支‘卡汉集团’（Kahane Chai）。^{[16]10}以色列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宣称巴勒斯坦是上帝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因此，1967年以来占领的土地和定居点是神圣不可放弃的；要采取一切手段将巴勒斯坦人从被占领土上驱除出去。宗教恐怖分子不仅行刺了积极推进中东和平的拉宾总理，还扬言如果巴拉克坚持拆除定居点就会行刺他。^{[5]330}在宗教话语动员能力增加的氛围下，以宗教视角看待并长期霸占‘被占领土’的极端思潮在以色列开始膨胀，犹太教的‘信仰者集团’等宗教极端组织纷纷产生，其中一些组织采取恐怖暴力手段。^①

宗教恐怖组织以宗教话语如殉教等来动员、培训恐怖暴力的实施者，为极端暴力手段提供合法性，以至于恐怖暴力的实施者将杀害平民看做一项神圣的宗教义务，并以能够实施恐怖暴力而感到自豪。行刺拉宾的凶手就狂妄愚顽地叫嚣，扣动扳机的不是他一人而是全体犹太人，因为那是上帝的命令。^[17]宗教恐怖组织甚至将一些自杀性袭击者行动前的告别仪式组织为宗教性的婚礼，以渲染自杀性袭击的宗教神圣性。1989~1995年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和松本市制造了两起沙林毒气袭击事件，导致24人死亡。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基地”组织就开始设法获取核材料以用作恐怖袭击的武器。^{[1]542-545}“宗教动员”、大规模杀伤武器与恐怖暴力一旦结合，将产生比广岛原子弹爆炸更为深远的影响。可见，恐怖组织的“神圣”宗教动员，在国际社会凸显了双重“安全阀”的失控。一是国际社会焦点矛盾的释放安全阀机制的失控，二是对国际暴力极端势

① 自1968年成立以来，“犹太防卫同盟”就一直主张要从肉体上消灭“异教徒”，奉行崇拜恐怖暴力。1980年初，策划袭击耶路撒冷老城“圣石圆顶清真寺”的恐怖计划，恐怖分子为此还掌控28枚精确制导炸弹；1980年5月行刺两名阿拉伯人市长；1983年7月，袭击希伯伦的穆斯林村庄，杀害3名穆斯林学生，伤33人。

力活动的失控。

国际社会热点地区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激化的一系列国际矛盾、诸多民族宗教和发展矛盾等等都没有有效的机制和渠道予以化解和消释，国际恐怖势力也因此能够以“宗教动员”对国际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进行扭曲解读。^{[18]30,44} 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没有有效的控制举措和“安全阀”机制，恐怖势力能够以“宗教动员”获得政治目标的合法性、目标敌人界定的合法性，以及恐怖暴力手段的合法性。因此，恐怖组织得以在国际社会聚集巨大能量，并极度膨胀。

五、结语

冷战后毫不逊色于宗教复兴运动（其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宗教回归社会政治生活，即“宗教回归”）的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普遍现象就是全球化。冷战体系解体、全球体系混乱，均显示出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每当世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时期，都会提出新的理论与话语构建的要求。^{[19]2-3,21} 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宗教全球复兴的并行，使得宗教话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全球化中的诸多矛盾所引发的社会张力面前充当一种社会运动的代言角色，也因此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的批评、反对的声音。^{[20]57} 宗教最容易在冲突和困难中吸引民众^{[21]157}，恐怖组织正是利用全球化世界的矛盾蛊惑宗教恐怖主义得以成功的。宗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话语和动员旗帜，宗教思潮的极端性和宗教恐怖暴力的强度愈演愈烈。一旦宗教与社会冲突结合，就将增加问题的复杂性，使冲突更加难以解决^{[22]297}，也进一步助长了宗教极端势力。当然，以宗教旗帜进行恐怖活动的，是宗教信徒中的极少数。^{[23]158} 正统宗教是坚定反对恐怖主义的，宗教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宣称的“宗教”，是违背传统宗教的真正宗旨的，是对宗教的反动和异化。

面对恐怖主义盗用宗教的名义进行的“宗教动员”和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形成路径，国际反恐斗争需要“宗教回归宗教”，以消除极端暴力组织进行“宗教动员”的社会环境并增强宗教在反恐斗争中的正面功用。“宗教回归宗教”的意义在于：一是世俗政治力量对宗教的正确理解和得当动员，可以避免“宗教动员”为极端暴力势力利用；二是宗教社会力量对宗教话语和旗帜的正确把握，可以形成与社会发展适宜的积极向上的宗教话语主流，从而避免极端势力借用宗教进行动员。这样，“宗教回归宗教”，就能为消除恐怖组织进行宗教蛊惑、动员而创造良好的宗教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 [1] Frank Shanty, Raymond Picquet. Encyclopedia of World Terrorism. Suicide Attacks Increase and Spread[EB/OL]. [2008-04-18].<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graphic/2008/04/18/GR2008041800293.html>.
- [2] 伊恩·莱塞,等. 反新恐怖主义[M].程克雄,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2.
- [3] 张金平.中东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 [4] David J. Whittaker, The Terrorism Reade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
- [5] 许利平.亚洲极端势力[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6] 石岚.中亚费尔干纳: 伊斯兰与现代民族国家[M].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8.
- [7] 徐以骅.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徐以骅,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四辑)[M].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7.
- [8] 彼得·伯格.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M].李俊康,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9] Joshua S.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0] 高师宁. 新兴宗教初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11] 卓新平. “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2] 金宜久. 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13] 徐以骅.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J]. 国际问题研究, 2010(2).
- [14] 朱威烈, 等. 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 [15] 涂龙德, 周华. 伊斯兰激进组织[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 [16] 郝时远. 种族主义与暴力恐怖活动[J]. 世界民族, 2002 (1).
- [17] Christopher Walker. Rabin Killer-Trained by Shin Bet[J]. *The Times*, 1995-11-08.
- [18] 高祖贵.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 [19]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20] 刘义, 陶亚飞. 从基要主义到恐怖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政治[J]. *社会*, 2007(5).
- [21] Steven Hause, William Maltby. *Western Civilization*[M]. Belmont, CA: West/Wadsworth, 1999.
- [22] 塞缪尔·亨廷顿. 我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23] Charles W. Kegley. *The New Global Terrorism*[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3.

“Religious Mobi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HANG Jinping & XU Yihua

Abstract Religious mobil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characters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While religious terrorism has become the leading power of the contemporary terrorism and has gone through triple lines, each of them shows double destructions of and challen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 valve. Analyzing the inundant lines can provide thoughts for anti-terrorism, that is, it can eliminate the surroundings and conditions in which terrorism carries out religious mobilization.

Key Words Religious Mobilization; Religion and Terrorism; Anti-terrorist Struggle; Religious Return; Terrorism

(责任编辑: 孙德刚)